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吐鲁番学与西域史论稿

施新荣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吐鲁番学与西域史论稿

施新荣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鲁番学与西域史论稿 / 施新荣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2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7689-7

I. ①吐… II. ①施… III. ①吐鲁番地区-地方史-研究②西域-地方史-研究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4134 号

吐鲁番学与西域史论稿

施新荣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唐妙琴
责任校对	刘雪峰 张小苹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300mm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48
版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7689-7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 1897 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薮,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 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 21 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我与吐鲁番学及西域史研究

美丽的边城乌鲁木齐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祖籍是浙江永康。

父母是 20 世纪 50 年代支援边疆建设，由浙江金华永康来新疆的。我的中小学时期曾在浙江永康的乡村学校借读过。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求学、治学应该比较顺利，但我的求学之路较为曲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上的是理化师资班（中专），因上学期间时间比较充裕，课余喜欢读儿时感兴趣的历史方面的书籍。我初入史学之门时没人指导，当时的《中国青年》《书林》等杂志上刊有“大学历史系必读书目”等文章，从那时起，我照着书单一本一本地买。当时读过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自学过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书籍，为以后的历史专业学习打了点基础。

1982 年 7 月，我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在一所企业职工学校，担任物理和化学课程的教学。闲暇之余仍然喜欢买历史书籍、读历史专业的教科书，我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汉书》等书就是在这期间买的。当时我一心想着要参加高考，想在大学里接受正规的历史学专业学习。1984 年秋，我考入了一所业余大学，在职接受历史学专业学习，一位担任中国古代史课的老师激发了我对中国古代史的兴趣。

1993年,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其间,我向校内金宝祥等先生问学,也通过书信向黄烈、余太山等先生求教,这些前辈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1996年研究生毕业,慕侯灿先生、钟国发先生之名来到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加之我对新疆这片神秘的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我的学习、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吐鲁番学与西域史。

来新疆师范大学后,钟国发先生已离开,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任职,甚为遗憾。还好,侯灿先生尚在历史系任教,是他将我引入了吐鲁番学与西域史研究领域。1998年秋,我陪侯灿先生去吐鲁番市参加新疆吐鲁番学会年会,会上有幸结识了部分新疆的吐鲁番学与西域史研究者。在往返吐鲁番的班车上,在会上会下,在参观交河故城、柳中故城的途中,侯老师讲解吐鲁番的历史以及如何研究吐鲁番学的见地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来后,我开始收集吐鲁番学方面的资料,在阅读前贤研究论著的过程中,发现了点问题,运用实证方法撰写了我的第一篇吐鲁番学研究论文。实证研究成为我日后从事吐鲁番学与西域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1999年初,随着侯灿先生定居成都,我的问学之路趋于困难,加之本人长期以来求学的愿望,2001、2002年,我连续两年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黎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2002年金秋,正值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得以负笈东行,忝列黎虎先生门墙,执弟子之礼,求学问道。这是我求学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三年,我被北师大浓厚的学术氛围所熏染,北京优越的学术条件,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

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同时阅读《吐鲁番出土文书》《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等出土文献资料。如所周知,前贤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历史文化的研究已非常全面深入,可谓题无剩义,欲在该领域取得一点成绩已不易,寻找到一个好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更难。加之自己较为愚钝,所以,这一年的阅读、思考,没有大的突破,只写过《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20世纪高昌研究综述》等文,始终未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吾师黎虎先生治学勤奋严谨、注重创新,他认为如无新意,就不值得做。承蒙他的宽容,尊重我的个人研究志趣,允我在明清西域史领域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最终确定以“哈密卫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打这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主要转向明清西域史。

2004年元月,受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卫疆先生之邀,参加由他主编的《吐鲁番史》一书的编纂工作,承担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朝时期”,即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吐鲁番历史的编著工作。我在撰写时对传世与吐鲁番盆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与隋代的资料进行梳理,于当年4月底递交出约六万字的文稿。

我在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资料收集与构思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先生、余太山先生,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卫疆先生的指点。在研究明代哈密历史时,我注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对明代哈密历史上一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了合理的推断,对明朝与哈密的贡赐贸易关系进行了探讨,梳理了明代哈密三种人(“回回”、“畏兀儿”、“哈拉灰”)的流变、对明代吐鲁番地面兴起的过程,对兴复哈密与明朝朋党之争进行了研究等,得到学界的认可。

有研究者撰文称：“关于明代西域政治史研究的国内学者有余太山、田卫疆、魏良弢、陈高华、王治来、施新荣等，国外学者则有美国人莫里斯·罗萨比；日本人堀直、佐口透；俄国人阿基穆什金等。他们对包括吐鲁番在内的古代新疆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此外，2007—2009年间，我主持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修订本）中《锡伯族简史》的修订工作，承担了《维吾尔族简史》前八章的修订工作。2009年，承蒙王素先生错爱，邀我与他共同承担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历代西域四夷外国传校订”项目（028），具体负责《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及《清史稿》部分。2010年，承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先生的课题，负责“明代西北地缘政治”部分，最终形成《明代西北地缘政治及其影响》一文，主要内容刊发在《人文杂志》上。

总之，从1993年读硕士研究生入学术研究之门，迄今已二十余年，我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吐鲁番学与西域史。

目 录

也谈高昌麹氏之郡望	(1)
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23)
5 至 7 世纪的高昌与丝绸之路	(33)
明代吐鲁番地面兴起考述	(44)
明成化弘治年间吐鲁番侵夺哈密与明朝之对策	(63)
明代西北地缘政治之演变	(87)
明洪武朝哈密研究二题	(106)
关于明永乐初年哈密的两个问题	(129)
明代哈密卫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	
——以贡赐贸易为中心	(145)
明代哈密卫部众渊源考	(165)
明代及清初哈密卫部众演进考述	(184)
兴复哈密与明正德朝宫廷朋党之争	(201)
明嘉靖初期朋党之争与置哈密不问	(216)
张骞西使研究概述	(232)
吐鲁番学	(245)

读《西域通史》	(298)
读《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	(302)
读《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	(312)
《明史·许进传》纠误一则	(321)
《明史·西域传》正误二则	(323)
后记	(328)

也谈高昌麹氏之郡望

关于高昌麹氏之郡望,学界一般认为是金城,但王素先生在《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出土材料分析、推测认为:高昌麹氏,除金城麹氏外,尚有西平麹氏^①。该文读后供人启发之处甚多,但也存在一些可供讨论之处。笔者不揣陋见,仅就该文中涉及的有关西平麹氏问题请教于王素先生,并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

为便于讨论,兹按王素先生在《初探》中所节录的有关高昌麹氏墓砖资料中所涉及的郡望、职官的内容,并参考黄文弼先生的《高昌砖集》(增订本)、侯灿先生的《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穆舜英、王炳华二位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和陈国灿先生的《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等书中的资

^① 王素:《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此文另由关尾史郎译成日文刊登在《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72、73、75、76号上。另参见王素:《吐鲁番文书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08—316页。